

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网络生态

时建中

治与网络治理的内在统一关系。在网络空间,算法推荐重塑信息传播秩序,数据利用触及人格尊严与财产权益,平台规则影响亿万用户行为模式,这些均关涉权利义务配置和公共利益保护。若任由“技术中立”论遮蔽价值导向、“去中心化”消解责任归属,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公平正义、侵蚀公共利益。坚持法治护航直面这些深层矛盾,以法治为技术发展明方向、立规矩、划底线,确保互联网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从制度功能看,法治在网络生态治理中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网络技术迭代迅猛,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网络乱象呈隐蔽化、变异化、跨区域化特征,运动式治理虽能形成阶段性震慑,却难以根除问题。法治将治理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将政策要求转化为法律义务,形成长期稳定、普遍适用、可预期可监督的治理框架。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落实到网络生态治理上,就是要构建涵盖网络内容管理、数据安全保护、算法治理、平台责任、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完整法律体系,使治理有法可依、执法有法可循、救济有法可寻。

从价值取向看,法治护航深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思想,适应数智技术迭代加速、网络业态深度融合、风险跨界传导的新形势,坚持法治护航,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 学习贯彻 众论

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2025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这些年的实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抓网络生态治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法治护航、坚持系统观念”。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思想在网络生态治理领域的聚焦与扩展,揭示了法治护航与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内在逻辑关系:法治护航并非外在于长效机制的工具性手段,而是构成长效机制内在结构的逻辑前提、效能保障与秩序归宿。只有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践行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治理要求,才能使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真正成熟定型。我们应认真领会、有机贯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思想,适应数智技术迭代加速、网络业态深度融合、风险跨界传导的新形势,坚持法治护航,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法治护航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思想的贯彻落实

网络空间是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活动的新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这一重要论述将网络生态治理提升到人民福祉的政治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网络虚无主义和技术无政府主义倾向,为将法治引入网络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法理基础。

从治理逻辑看,法治护航深植于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思想在网络领域的交汇与贯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坚持法治护航将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向网络空间纵深推进,揭示了法

法治护航是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关键枢纽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法治护航、坚持系统观念,这“五个坚持”是一个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坚持法治护航承担着特殊而关键的功能,是将党的领导政治原则、人民至上价值立场、守正创新内在活力、系统观念整体方法贯通于制度实践的关键环节,是网络生态治理从实践探索走向制度定型的必由之路。网络生态治理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唯有经由法治的提炼与固化,才能摆脱对特定情境和个体推动的依赖,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和持续生命力的长效机制。因此,在“五个坚持”中,坚持法治护航是对其他四个坚持的制度承载,是实践逻辑向制度效能转化的核心机制,是“实践—理论—制度”完整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坚持法治护航的核心要义,在于将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完整准确地贯彻到网络空间,使网络生态治理的一切工作都在法治轨道上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统筹推进网络领域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科学立法及时回应新技术新业态的法治需求;严格执法确保法律在数字空间“长出牙齿”,让违法者依法受惩戒、守法者畅行无阻;公正司法通过个案裁判确立行为自觉。这四者用法治手段,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教育作用;全民守法要求广泛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使明确各方权利义务从法律要求转化为亿万网民的行为自觉。这四者用法治手段,确保网络生态治理的一切工作都在法治轨道上展开,形成可执行、可监督、可问责的制度安排。

坚持法治护航,回应了统筹技术创新发展与网络空间秩序建构的重大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治理逻辑:技术发展越快、应用越广、渗透越深,治理就越不能依赖临时措施和主观判断,越需要法治提供稳定框架。一方面,法治为科技创新提供稳定预期和制度保障,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发展,实现“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另一方面,法治为防范化解网络空间风险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完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使技术发展始终保持服务人民的正确航向。

法治护航对于完善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根本性转变上:一是将政策推动转化为制度驱动,使治理从倚重专项部署走向依靠法律法规常态化运行;二是将集中整治转化为常态运行,使治理从阶段性攻坚走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运作;三是将单一主体转化为协同共治,通过法律明确各方权责,形成网络生态良好治理格局,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法治护航是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秩序归宿

对于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这四个目标维度,同样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前瞻性是时间维度上的预见与引领,重在以制度预判技术变革趋势和治理风险,使治理走在问题前面;精准性是操作维度上的识别与裁断,重在以明晰规则实现分类施策、过罚相当,杜绝粗放式治理;系统性是结构维度上的整合与贯通,重在以协调融贯的制度体系覆盖网络空间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

刘焕明



“因可势,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我国幅员辽阔,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拥有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禀赋和文化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这一精辟论断,蕴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智慧,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更为党员干部破除同质化发展迷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的延展,昭示了未来的广阔发展空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关键在于真正读懂脚下这片土地,善于在“特”字上做文章、下功夫、找突破,把别人无法复制的“特色”锻造为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把不可替代的“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潜力”。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掌握了这门立足实际、深挖潜力的施政艺术,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棋局上落子生輝。

在基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实践中,少数党员干部患上“盲从病”,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淖。比如,有的无视本地文化底蘊,盲目打造千篇一律的人造景观;有的脱离客观实际,罔顾本地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基础,强行上马同质化项目。这种“东施效顰”式的模仿,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折射出政绩观的错位。这些做法或许能换来一时的“显绩”,却透支了地方长远发展的“元气”。

特色,既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空洞噱头,也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移植过来的盆景,而是深深扎根于地方水土之中自然生长出来、依靠广大人民的创造形成的。要找准特色,就必须彻底跳出“抄作业”的思维窠臼,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慧眼去洞察表象。进一步来看,若是只着眼于当下,优势往往容易在急功近利中被消耗殆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在于善用当下的优势,更在于将优势视为指向未来的潜力去持续深耕。只有一锤接着一锤敲,让时间孕育潜力,才能让地方的特色资源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深井,奔涌不息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甘泉。

昔日的福建宁德,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干部群众中一度弥漫着急躁情绪。习近平同志到任后,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走遍了宁德的下辖县。在摸清家底后,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引导干部群众

各领域各环节,避免碎片化治理;协同性是主体维度上的联动与合力,重在以法治化权责配置构建多方主体有序参与的共治格局。四个维度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法治护航是贯通这四个维度的主线,即以前瞻性立法锚定规则框架,以精准性执法实现规则效能,以系统性制度整合规则体系,以协同性机制凝聚规则合力,四维一体共同指向“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的秩序目标。

长效机制的终极目标,在于形成能够自我维系的规范性秩序,即“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建立在正当规则基础之上并被普遍遵循的秩序,具有内生稳定性与自我强化能力。法治正是这种规范性秩序的中枢神经和制度化再生产机制。它通过确定权利义务的清晰边界、提供争议解决的理性渠道、确立行为评价的公正标准,使秩序成为一种制度化、可预期的常态存在。

法治护航作为秩序归宿,意味着它将以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构筑为一种权利受保障、义务得均衡、责任可追究、救济有渠道的制度化秩序形态。在这一秩序中,法治并非单向度的管制工具,而是通过设定公平合理的权利义务结构,在信息流动与内容管理、表达权与人格权、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等张力关系之间嵌入权利义务的清晰边界,提供争议解决的理性渠道、确立行为评价的公正标准,使秩序成为一种制度化、可预期的常态存在。

理论创新能否体现问题导向,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并阐释“典型事实”。“典型事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和深刻影响,又具有深远和广泛世界意义的事实。这种“典型事实”是发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时代命题,其产生和解决的社会条件都具有时代性。

在发现“典型事实”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系统描述和阐释“典型事实”,不仅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意上把事实本身的面貌描述清晰,而且将与之相联系的基本问题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动因阐释清楚。这要求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史上讲清为什么会有这一基本问题和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实践,也要从广泛的国际比较中概括“典型事实”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

以我国产业体系为例。我国拥有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产业链韧性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构成了我国产业链韧性的稳固基础,也使我国产业链韧性在外部冲击下逆势跃升。这是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事实”。我国产业链韧性既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比如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单纯注重发挥比较优势,这容易造成关键环节对外依赖、产业体系碎片化;又突破了依赖市场自发调节的逻辑,比如完全放任市场逐利易引发产业空心化等;还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比如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资源高效统筹,依靠完备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夯实产业链韧性根基等。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典型事实”的发现和阐释,首先必须明确站在怎样的立场、基于怎样的价值取向去辨析何为“典型事实”,在此基础上更需要确立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因为“典型事实”的发现和选择以实践为依据,具有深邃的历史动因和相应的发展条件,进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认识“典型事实”的进步性。另一方面,需要坚持“两个结合”,从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代问题、适应历史发展客观需要的角度,深入把握“典型事实”的客观性。总的看,“典型事实”应当是这种进步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只有在发现“典型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炼思想观点,构建学术体系,形成逻辑结构,以揭示“典型事实”、理论观点的内在联系和演进动因。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构建学术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发现和描述“典型事实”,也不能停留在形成基本观点和思想批判上,还需要进行深入凝练,形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所必需的学术概念和范畴、基本元素和思想符号。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术语的革命”。在整体的经济学说体系上,尽管不同历史形态下反映不同阶级利益要求的经济理论具有根本对立甚至整体性否定的特点,但在经济学基本概念和范畴上则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当然,这种继承主要是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进行了深刻的术语革命,特别是创造性提出了一些极具革命性意义的学术概念和思想范畴。这说明,要创造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在概念范畴上完全依赖运用已有的经济学术语是不可能达成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中国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是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回答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中发现“典型事实”、凝练标识性概念和范畴。

增强问题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对何谓“问题”有深刻理解。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本身具有时代性。一方面,问题的提出具有时代性,即社会发展总是会提出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另一方面,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条件具有时代性,即社会发展为解决相应的问题创造了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历史过程,基于发展本身创造的思想条件和实践条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时代问题。

与问题时代性相联系的是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学说,特别是揭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规律的理论,必须回答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科学应当具有证实或证伪的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的证实或证伪,不能只是理论逻辑上的自洽和推演,更需要经过社会运动的实践检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的理论结晶,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

正是这种深刻的实践性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经济发展首先是各国各民族自身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经济理论首先要回应并指导本国本民族的经济实践。同时,只有首先解决、处理好本国本民族经济问题才能对人类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其经济理论才能产生世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正是建立在中国作为当代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基础上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逐渐成为从民族走向世界的经济学说,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一般性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特点。

发现“典型事实”

理论创新能否体现问题导向,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并阐释“典型事实”。“典型事实”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是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和深刻影响,又具有深远和广泛世界意义的事实。这种“典型事实”是发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时代命题,其产生和解决的社会条件都具有时代性。

在发现“典型事实”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系统描述和阐释“典型事实”,不仅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意上把事实本身的面貌描述清晰,而且将与之相联系的基本问题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动因阐释清楚。这要求我们既要从实践发展史上讲清为什么会有这一基本问题和相应的解决问题的实践,也要从广泛的国际比较中概括“典型事实”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

以我国产业体系为例。我国拥有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产业链韧性强。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构成了我国产业链韧性的稳固基础,也使我国产业链韧性在外部冲击下逆势跃升。这是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事实”。我国产业链韧性既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比如强调国际产业分工、单纯注重发挥比较优势,这容易造成关键环节对外依赖、产业体系碎片化;又突破了依赖市场自发调节的逻辑,比如完全放任市场逐利易引发产业空心化等;还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比如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资源高效统筹,依靠完备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夯实产业链韧性根基等。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典型事实”的发现和阐释,首先必须明确站在怎样的立场、基于怎样的价值取向去辨析何为“典型事实”,在此基础上更需要确立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因为“典型事实”的发现和选择以实践为依据,具有深邃的历史动因和相应的发展条件,进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根本标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中认识“典型事实”的进步性。另一方面,需要坚持“两个结合”,从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代问题、适应历史发展客观需要的角度,深入把握“典型事实”的客观性。总的看,“典型事实”应当是这种进步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只有在发现“典型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提炼思想观点,构建学术体系,形成逻辑结构,以揭示“典型事实”、理论观点的内在联系和演进动因。

凝练概念和范畴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构建学术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发现和描述“典型事实”,也不能停留在形成基本观点和思想批判上,还需要进行深入凝练,形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所必需的学术概念和范畴、基本元素和思想符号。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术语的革命”。在整体的经济学说体系上,尽管不同历史形态下反映不同阶级利益要求的经济理论具有根本对立甚至整体性否定的特点,但在经济学基本概念和范畴上则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当然,这种继承主要是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进行了深刻的术语革命,特别是创造性提出了一些极具革命性意义的学术概念和思想范畴。这说明,要创造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在概念范畴上完全依赖运用已有的经济学术语是不可能达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不仅蕴含着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素材,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命题。基于对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探索,党的创新理论取得了一系列丰富成果,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供行动指南的同时,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引领。我们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下,形成学理化、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是要凝练抽象出一套系统完备的学术概念和范畴。

要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有概念范畴的同时,注重从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中、从我国经济实践与理论探索的良性互动中提炼学术范畴和概念,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民营经济、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等。还要借鉴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对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注意借鉴;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通过学理化、系统化的学术概念和范畴,推动构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宏伟理论大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点

刘伟